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第一卷

童年 少年 青年

谢素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ЮНОСТЬ

---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  
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插图作者 КАШЕЕВ。

责任编辑：磊 然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

Liefu Tuorsitai Wenj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16}$  插页 6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750

---

书号 10019·4035

定价 4.55 元

## 目 次

总序 .....	陈 染 1
----------	-------

### 童 年

一 教师卡尔·伊万内奇 .....	3
二 MAMAN .....	9
三 爸爸 .....	12
四 上课 .....	16
五 苦行者 .....	20
六 准备打猎 .....	25
七 打猎 .....	27
八 游戏 .....	31
九 似乎是初恋 .....	33
十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	35
十一 书房和客厅里的活动 .....	37
十二 格里沙 .....	41
十三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 .....	44
十四 离别 .....	48
十五 童年 .....	53
十六 诗 .....	56
十七 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 .....	62

十八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66
十九	伊温家的孩子们	70
二十	宾客盈门	77
二十一	跳马祖卡舞以前	82
二十二	马祖卡舞	86
二十三	马祖卡舞以后	89
二十四	在床上	92
二十五	信	94
二十六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99
二十七	悲痛	102
二十八	最后的悲痛回忆	106

## 少 年

一	长途旅行	119
二	雷雨	125
三	新观点	130
四	在莫斯科	134
五	哥哥	135
六	玛莎	138
七	铅弹	140
八	卡尔·伊万内奇的身世	144
九	续前	148
十	续前	152
十一	一分	155
十二	小钥匙	161
十三	见异思迁的姑娘	163

十四	一时糊涂 .....	165
十五	幻想 .....	167
十六	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	171
十七	仇恨 .....	176
十八	使女室 .....	178
十九	少年时代 .....	183
二十	沃洛佳 .....	186
二十一	卡坚卡和柳博奇卡 .....	189
二十二	爸爸 .....	190
二十三	外祖母 .....	193
二十四	我 .....	195
二十五	沃洛佳的朋友们 .....	196
二十六	讨论 .....	198
二十七	友谊的开端 .....	203

## 青 年

一	我认为这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	209
二	春天 .....	210
三	幻想 .....	213
四	我的家庭圈子 .....	217
五	准则 .....	221
六	忏悔 .....	223
七	去修道院 .....	224
八	第二次忏悔 .....	227
九	我怎样准备考试 .....	230
十	历史考试 .....	232

十一	数学考试	237
十二	拉丁语考试	240
十三	我是大人了	244
十四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在做什么	248
十五	大家向我道贺	252
十六	口角	256
十七	我准备出门拜访	261
十八	瓦拉希娜夫人家	264
十九	科尔纳科夫一家	268
二十	伊温一家	271
二十一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275
二十二	和我的朋友谈心	277
二十三	涅赫柳多夫一家	282
二十四	爱	287
二十五	我认识了	292
二十六	卖弄聪明	296
二十七	德米特里	299
二十八	在乡下	304
二十九	我们同姑娘们的关系	308
三十	我的工作	312
三十一	COMME IL FAUT	316
三十二	青年时代	319
三十三	邻居	325
三十四	父亲的婚事	329
三十五	我们怎样接受这个消息	332
三十六	大学	337

三十七	恋爱事件 .....	342
三十八	社交 .....	344
三十九	酒宴 .....	346
四十	同涅赫柳多夫一家的友谊 .....	351
四十一	和涅赫柳多夫的友谊 .....	354
四十二	继母 .....	358
四十三	新同学 .....	363
四十四	祖欣和谢苗诺夫 .....	369
四十五	我失败了 .....	375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第一卷 童年 少年 青年
-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 第四卷 中短篇小说
- 第五卷 战争与和平(一)
- 第六卷 战争与和平(二)
- 第七卷 战争与和平(三)
- 第八卷 战争与和平(四)
- 第九卷 安娜·卡列宁娜(上)
- 第十卷 安娜·卡列宁娜(下)
- 第十一卷 复活
- 第十二卷 故事
- 第十三卷 戏剧
- 第十四卷 文论
- 第十五卷 政论
- 第十六卷 书信
- 第十七卷 日记



## 总 序

我哪天都在想：“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却只写出万分之一（《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莫斯科，1962年，第261页）。

托尔斯泰这段话写于一八六五年，当时他正致力于创作《战争与和平》。在这之后，他又写出了《安娜·卡列宁娜》等杰作。虽则他一生中把大量时间花在教育事业、社会活动以及政论和宗教论文等上面；虽则他在世界观激变之后羞于写文学作品，长期搁置了生花之笔，但他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已是光芒万丈，足以炳照千秋了！

诚然，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有许多弱点的，我们并不为贤者讳。他自己说过：“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题词：‘我无所讳言’。仅仅不公然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第19页）这也是我写序言的一个原则。

在这篇序言里我的任务是作为广大读者的一个导游。因此，我不是作概括的论述，而是沿着作家的思想的轨迹简要地逐一谈谈他的作品，最后再粗浅地谈谈他的创作的几个艺术特点。

古往今来，恐怕很少作家象托尔斯泰那样在大量创作里贯穿着自传性因素。除了众所周知的伊尔杰尼耶夫、涅赫柳多夫、奥列宁和列文以外，在《袭击》中的志愿兵、《伐林》中的士官生、《家庭幸福》中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皮埃尔、《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以至谢辽沙、《舞会以后》中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28—1855]莫斯科，1954年，第4页）、以及《魔鬼》中的叶夫盖尼·伊尔杰尼耶夫、《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萨雷左夫等人物身上，都这样那样地闪现着作家本人的影子。当然，我们不会简单地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托尔斯泰自己说过，《童年》中“凌乱地混合着”他童年的朋友的故事和“我的童年的故事”。托尔斯泰的秘书，著名的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古谢夫则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许多艺术作品初稿中通常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自传成分，而在后来的稿子中自传成分常常冲淡，而且部分地被作者勾消了。”（《传记资料》，第4页）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创作不是自我表现，而主要是“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历史生活”（列宁语）的反映。问题在于，托尔斯泰是个“实践的人”，在创作中不只限于作社会历史的“秘书”，而是与其中某些人物一起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道路。自传因素不一定在于作品中的事实和作家的经历吻合，而主要在于同某些人物的思想情绪肖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他的心灵的发展史。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书“是十九世纪一个强有力的个性从事的一切探索的文献性叙述，这一个性旨在寻找自己在俄国史

上的地位和事业。”（《俄国文学史》，莫斯科，1939年，第295页）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思想探索是在追求心灵上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这种和谐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步作家的共同理想，不过，作为“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高尔基语），他身上充满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所构成的“惊人的矛盾”，他的和谐的理想有自己的内容。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近六十年，而主要“属于一八六一至一九〇四年”。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怪物”象一把双面刃插入农村，既鲸吞贵族地主的地产，又扫荡农民经济的“旧基础”。贵族地主和农民都面临双重的威胁：在前者，一方面是农民几百年积起来的愤怒海洋，另一方面是“新主人”在“樱桃园”里不断响起的丁丁斧声；在后者，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的魔爪，另一方面是原始积累带来的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新灾难。这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身名门世族。他自幼在上层圈子中长大，早年就染上贵族社交界的某些恶习和偏见。与其他俄国大作家不同，托尔斯泰不仅拥有田产，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亲自经营。直到世界观激变前夕，在一八七一和一八七八年他还先后购置土地六千五百俄亩（约七千公顷）。我们并不同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大地主”（《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67页），但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与他的生活条件相适应，他的创作是带有本阶级的鲜明印记的。

不过，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思索人生，“要为别人而活着”。在十九岁时更认识到，人不是孤独的，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假使人人追求自己的福利”，将会由此产

生“秩序的混乱”，反之，“假如人人力求自己本人的完善，秩序就怎样也不会遭到破坏……”（《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卷，第299页）追求个人完善，要为别人而活着，确实象他在五十年代末说的：“永远成为我的信念”。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是贵族地主，又因长期居住农村，熟悉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对地主的不信任和憎恨，他早就知道，“存在着奴隶制的当代，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论文学》，第28页）也就是说，他要个人完善首先要解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何况他的清醒的头脑对俄国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腐败不能不感到厌恶。另一方面，由于立场的限制，也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他只追求个人完善，只主张从道德上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变革社会。与此同时，出于对战胜他的本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憎恶，和对因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陷于破产的农民的同情，他完全不能接受资本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他同农民经常接触，日益深入地认识到他们的优良品质。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过去，向往他所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遗风，长期沉迷于天真的幻想，探索地主与农民和睦相处的道路，希求从此获得内心和谐。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安娜·卡列宁娜》，都贯穿着这种幻想，只是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矛盾明朗化，这种幻想渐趋幻灭，而他探索新的出路的追求也日益强烈。最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俄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激荡下，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然而他的心灵并没有获得宁静。他呼吁勿以暴力抗恶，无如这种说教无力消除社会上的“恶”并阻止它使用暴力，他对自己的教义逐渐表示怀疑。一九〇五年，宗法制农民大都受到当时俄国革命的影响，或卷入革命运动的洪流，他因自己同他们思想上有了分歧而悲观失望；同时对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言行矛盾也深

感不安。他在晚年多次要离家出走（这在《谢尔盖神父》、《复活》、《活尸》和《光在黑暗中发亮》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最后于一九一〇年走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在同自己的环境的决裂中实现和谐的理想，终于以自己的生活的悲剧来了结思想的悲剧。

## 二

托尔斯泰少年时代曾从哲学方面探索人生意义问题，后来从喀山大学回家，曾在自己庄园试行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自己与农民的关系，因农民不信任而未果。失望之余，他去莫斯科和彼得堡过了一段放荡生活，旋又感到厌倦，于一八五一年随哥哥去高加索从军，就在这里开始了创作活动。因此，苏联学者布尔索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达到他追求个人完善的目的，先是研究哲学，继而付诸实践，最后从艺术领域中找到实现这个目的——人生使命的手段（《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莫斯科，1960年）。实际上，哲学家—实践家—艺术家，既是他走向艺术的历程，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三个方面，他是三位一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正以此迥然不同于那些把创作当作目的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

第一部发表的作品《童年》（1852）和以后陆续写成的《少年》、《青年》的主题，是主人公（大体上是作家自己）个性成长的过程。《童年》写的主要是两天时间（一天在庄园，一天在莫斯科），以主人公过自觉的生活开始而以失去童心结束；《少年》的内容，据作家说，是“孩子在童年之后逐渐腐化以及后来他在青年时期以前的改善”（《全集》，第46卷，第286页）；《青年》则写主人公对美、幸福和美德的向往；最后一章“我失败了”既指考试、也指

这种追求的失败。作品写作时期离故事发生时间已隔多年，作者的观点有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三部曲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过去，即主人公当时的观感；一个是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是批判性的，对于《童年》中宗法制的牧歌式的主仆关系，作者仍然一往情深；至于《少年》和《青年》中某些民主倾向，后来作者自己说，是写作时所没有的，是不真诚的（皮雷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柏林，1921年，第1卷，第72页）。

和三部曲同时创作的是同样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战爭小说。这些小说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写在战争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品质。《袭击》开头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这个“勇敢”的定义是他的全部战争题材作品中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作家歌颂朴实平凡、但却坚毅勇敢的士兵和普通军官，鄙薄外表威武、内心渺小、充满虚荣心和名利欲、漠视士兵死伤的贵族军官。小说一反俄国过去战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描绘战士英勇沉着的同时，绝不隐讳他们的恐怖感和战争的残酷性，并对战争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说：“战争就是疯狂”。

战争小说以《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最为出色。在这场战役中，作家看到人民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所以他在该书中说：“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他早已看到贵族们意志薄弱，缺乏毅力，在战争中加深了这种认识。在这段时间内写的《台球房记分员手记》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同样反映了贵族的生活空虚和道德堕落。作家原来希望这次战争能使统治阶级得到道德上的复兴，并使俄国社会中各阶层的目标趋于一致，可是这个幻想落空了。

塞瓦斯托波尔尔陷落后，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五年底来到彼得

堡，作为文学界的新秀受到热烈的欢迎。从《童年》起，他一直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作品，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格格不入。在当时彼得堡文学界的三个集团——革命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中，他采取超然的态度。当时正是俄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刻。克里木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战争的失败又暴露了沙俄政府和农奴制的腐败。继尼古拉一世自杀后，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势在必行，决定自上而下进行。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曾多次拟定解放农奴的纲领，并在自己的庄园内试行。他在这个时候写成了开始构思于一八五二年的关于“一个俄国地主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即《一个地主的早晨》。这其实可以说是《童年》等三部曲的续篇，是他构思而未完成的《成长的四个时期》的第四部分。据他的秘书，著名的他的传记作者比留科夫说，小说内容是一八四七年间作家的亲身经历，不过它不免夹杂着作家写作此书时的活动和感受。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贫穷和落后，展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但是主人公的行为的动机虽则是鉴于农民的赤贫，但主要是自己对他们的责任。造福农民是希求同农民的关系的和谐，而首先是自己内心的和谐，这是八十年代以前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八五六年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气氛曾使托尔斯泰抱有各阶级一致行动的幻想，而随后兴起的农民起义和社会运动却使他感到威胁。他的文学观和创作都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一度接近自由主义者作家德鲁日宁等人，接受他们的“纯艺术”观点，反对文学中的暴露倾向，反对为政治的艺术（见1856—1858年间致涅克拉索夫、包特金和屠格涅夫的几封信）。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发表前他删去描写富农和官吏胡作非为的章节，就是这种思

想倾向的例证。不过，在当时他仍然肯定萨克雷等作家的讽刺作用，他自己未完成的剧作残稿中也不乏讽刺色彩。关键在于讽刺什么，揭露什么，当涉及社会重大问题时，他就望而却步了。这也正是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观上的分歧之所在。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第一次出国，到过法、德和瑞士等国家。资本主义文明使他认识到俄国的“丑恶”和“野蛮”，以致不得不“长久地与厌恶祖国的情感作斗争”（《论文学》，第38页）。但他始终不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农奴制而言有其相对的进步意义。这也表现于作品中。早在《两个骠骑兵》里，他就把父辈描写得高于子辈，欣赏老图尔宾放荡不羁和豪迈慷慨的封建骑士精神，而鄙视小图尔宾工于算计和讲求实利的资产阶级习气。对于他的《卢塞恩》，通常都肯定其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象对小图尔宾的讥刺一样，确是作品的有力的一面。但作家却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如果拿《卢塞恩》和《阿尔贝特》对照，更可看出他的偏见。布尔索夫中肯地指出，前者基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因而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描写的中心是客观现实；后者基于俄国生活，虽也批判，却并非完全否定，所以着重写艺术家及其心理（《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第274—275页）。俄国社会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欧，为什么作家不愿正视现实呢？不能以爱国的感情来解释。涅克拉索夫在给他的信里说：“您目前在农村里过得很好，所以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愤恨。……难道我国要愤恨的理由还少吗？当我们愤怒得越多，我们就越爱……自己的祖国。”（《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第35页）

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国的“恶”，也想改变现状，只是反对使用暴力，认为以暴力同恶斗争，将会使恶增加，因为依他看来，任何的暴力都是“恶”。他把俄国看作一片“泥泞”，面临



的抉择是“沿着这片泥泞往上爬或是绕弯走”。他选的是后者。在上引的信里他写道：“……在俄国全是丑恶、丑恶、丑恶。……幸而还有生路，这就是精神的世界，艺术、诗和爱恋的世界。这里没有警察局长、没有管事，谁也不会打扰我。”（《全集》，第60卷，第232页-第222页）艺术和爱恋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这几年间创作的主要内容。如果说《阿尔贝特》遁入艺术，那么《三死》便是遁入自然。不错，《三死》不乏批判因素，如贵族太太的虚伪做作。然而，在作家看来，越接近自然就越幸福，树木之死比农民之死还要安详些。

遁入爱情和艺术的思想集中表现于《家庭幸福》。小说有自传性质，但这与其说是作家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写照。写作期间他的一些书信日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小说潜在的主题是主人公困扰于生活风波而躲入个人小天地。小说之所以用女主人公来叙述，并着重写她的内心感受，也是为了避免涉及社会矛盾。这是一部在“纯艺术”思想支配下写成的失败之作。作家自己曾认为：“宁静是心灵上的卑鄙”，他痛苦地承认，“在成年时期浪掷生命”去写这类作品“是问心有愧的”（《全集》，第60卷，第231页，第308页）。他甚至要把第二部分的校样索回付之一炬。

在这部小说之后他懒于写作，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创办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在农奴制改革中任和平调解人，这些活动使他进一步接近农民，并对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有所认识。《波利库什卡》可以说是其产物。的确，较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个作品的批判因素有所削弱，但它不仅描写了农奴的悲惨命运，而且揭示了农奴与地主的深刻对立。地主太太对波利凯依的信任并不能改变农奴整个说来不被了解和信任，因此波利凯依在丢失巨款之后深知无以自明，只能一死了